

新中国 GDP 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研究^{*}

郭旭红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GDP 增长速度总体较快,但呈现出“高速—低速—高速—中高速”发展的特征。与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宏观经济与各地区微观经济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后 30 多年来,两者的稳定性同时增强,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格局。与二战后高速增长的其他经济体和遭受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进行比较,1978—2012 年,中国打破了世界经济史上 GDP 高速增长的纪录。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人口红利、科技创新、投资,是 GDP 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目前,受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GDP 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发展。系统考察新中国 GDP 增速的演变历程,深入研究波动的原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 GDP 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对经济新常态下 GDP 中高速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 GDP 增长速度 发展演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①但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差异。1950—1952 年实行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体制上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迅速发展,但是造成了全面“短缺”和经济的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并引发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和干扰了国家的经济建设,造成经济增速“大起大落”。1978—2012 年中国 GDP 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制度变革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2013—2015 年受到国内外环境条件制约,中国 GDP 增速由 10% 左右的高速回落至 7% 左右的中高速。GDP 高速增长、中高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中的常见现象,但有中国特色。在坚持“四要四不要”的标准下,合理的 GDP 增长速度是以 7% 为中轴线的上下波动。

一、GDP 增长速度的阶段性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整体看 GDP 年均增速很快,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 GDP(以下数据除注明者外,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依据,可以将 1949—2015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分为 1949—1956 年快速增长、1957—1978 年慢速增长、1979—2012 年高速增长、2013—2015 年中高速发展四个阶段。1949—2015 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慢速—快速—中高速”发展的状态。与改革开放之前 GDP 增长速度波幅较大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相对平缓。

[作者简介]郭旭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009,邮箱:2294317295@qq.com。

* 感谢赵德馨、武力、魏明孔、瞿商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供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和资料,当然文责自负。

①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 页。

(一) 1949—1956 年快速增长

1949—1956 年 GDP 快速增长, 年均增长率达 14.2%。这一阶段包含 1950—1952 年、1952—1956 年两个周期。其中第一个周期的最高、最低增长年度分别是 1952 年和 1951 年, GDP 增速分别为 22.3% 和 16.6%。1950—1952 年新中国成立后, 国民经济需要迅速恢复, 属于恢复性经济增长。若排除恢复性增长的年份, 1953 年和 1956 年都为波峰年份, 为一个完整周期; 其中最高、最低增长年份分别为 1956 年和 1954 年, GDP 增速分别为 14.1% 和 5.8%。这一周期 GDP 增速波动周期较短, 强度不大; 波位较高, 较为平缓(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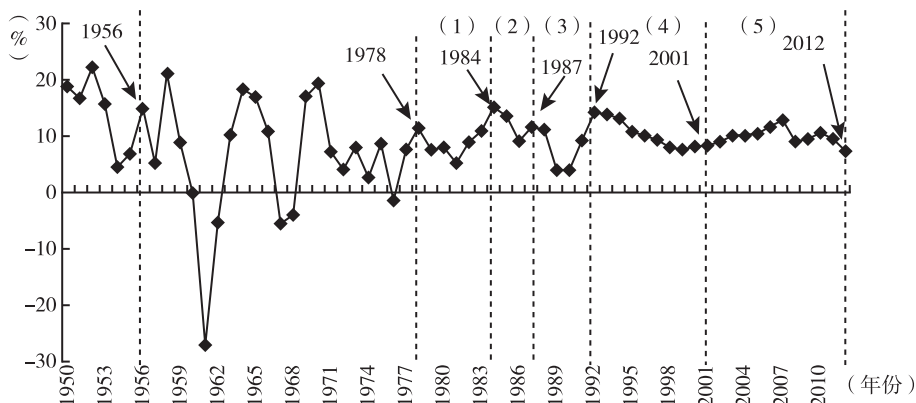


图 1 1950—2012 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波动曲线

资料来源:1950—1952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23 页;1953—2008 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 页、第 11 页;2009—2012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5 页。

说明: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 1950、1951、1952 年 GDP 数据,用《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 22 页、第 23 页的国民收入代替,根据国民收入指数算出 GDP 增长率。

(二) 1957—1978 年慢速增长

1957—1978 年 GDP 年均增长 6.0%, 在新中国经济史上, 这 22 年是 GDP 增速较慢的时期。其中, 经济增长较高的 1958 年, GDP 增速为 21.3%; 最低的 1961 年, GDP 增速为 -27.3%, 两者相差将近 50 个百分点, 波动幅度非常剧烈。1960 年、1961 年、1962 年、1967 年、1968 年、1976 年六年出现负增长, GDP 增长率分别是 -0.3%、-27.3%、-5.6%、-5.7% 和 -4.1%。这一阶段包括六个周期, 分别是 1956—1958 年、1959—1966 年、1967—1970 年、1971—1973 年、1974—1975 年、1976—1978 年, 其中第二、三、六个周期属于经济增长绝对下降的古典周期。这一时期 GDP 增速波动周期较短, 波幅较大, 波位较低, 属于低位一大起大落的波动类型, 其波动之剧烈在世界经济史上罕见(图 1)。

(三) 1979—2012 年高速增长

1979—2012 年, 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高达 9.9%, 而同期世界 GDP 平均增长仅为 2.9%,^① 中国是世界平均增速的 3 倍多。同期, 全国整体 GDP 增长速度的稳定性增强。中国 GDP 增长速度波动起伏的曲线显示(图 1), GDP 增长的三次高峰是 1984 年、1992 年和 2007 年, 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15.2%、14.2% 和 14.2%; 三次低谷是 1981 年、1989 年和 1990 年, GDP 增长率仅为 5.2%、4.1% 和 3.8%。这一阶段包括 1979—1984 年、1985—1987 年、1988—1992 年、^②1993—2001 年、2002—2012 年 5 个周期,^③ 平均每个周期 4.8 年, 它们都属于经济增长周期(没有负增长)。与改革开放前相比, 波幅减小很多。5 个周期内平均增长率最高达 11.3%, 最低达 8.7%, 相差不到 3 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周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②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401 页。

③ 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 60 年》,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1 页。

期呈现“微波化”的新趋势,印证了刘树成的判断。^① GDP 增速有 4 次连续 2 至 3 年低于 8%,1979—1981 年是第一次,1989—1990 年是第二次,1998—1999 年是第三次,2012 年是第四次。由于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例如 1998—1999 年亚洲金融危机、洪灾以及 2008 年的地震灾害等随机冲击造成 GDP 增速有所放缓,但前 3 次 GDP 增速回落后又高速增长。这一时期 GDP 增速波动周期较长,波幅较小,波位较高,较稳定,属于高位一平缓型(图 1)。较小的波动表明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健。^②

(四) 2013—2015 年中高速发展

2013—2015 年,GDP 增速分别为 7.7%、7.4% 和 6.9%,GDP 增速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发展,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主要由依靠资源和要素高投入驱动的 GDP 高速转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中高速发展的反映和要求,是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理性回归和质量速度效益的和谐统一。^③

二、GDP 高速增长的国际比较

(一) 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比较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能够保持 GDP 将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首先是日本,1956—1973 年 GDP 保持了 18 年 9.2% 的高速增长;其次是新加坡,1963—1979 年 GDP 保持了 17 年 9.3% 的高速增长;再次是韩国,1966—1979 年 GDP 保持了 14 年 9.1% 的高速增长。^④ 1978—2012 年,中国 GDP 年增速 9.8%,持续了 35 年的高增长,打破了经济起飞时期日本和“四小龙”创下的高增长纪录。

(二) 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较

1979—2012 年,中国 GDP 增长速度绝大部分时间位居“金砖四国”的首位,年均增长率为 9.8%;印度则紧随其后,GDP 年均增长率为 5.9%;俄罗斯从 1999 年起迎头赶上,1999—2012 年 GDP 年均增长率为 5.3%;而巴西 1979—2012 年 GDP 年均增长率为 2.9%,处在最后(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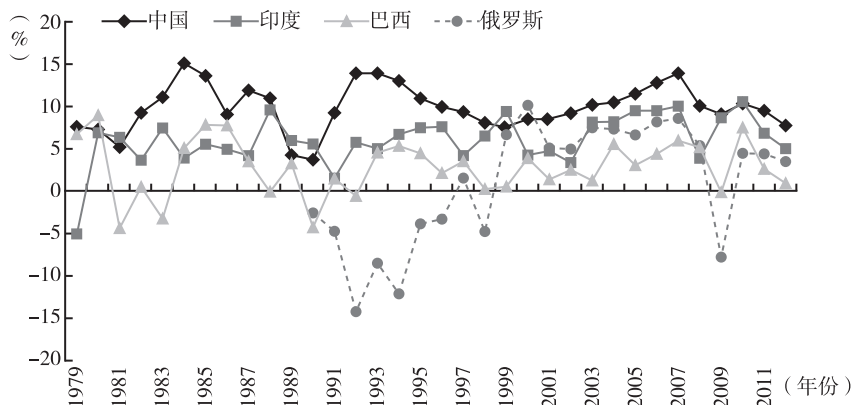


图 2 1979—2012 年金砖四国 GDP 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cn>。

(三) 与二战后高速增长 11 个经济体比较

通过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 11 个经济体 GDP 增长率(表 1),可以看出 GDP 增速最高的前 3 个经济体依次是阿曼、博兹瓦纳和中国。按持续高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平均

① 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8 页。

② 王少平、胡进:《中国 GDP 的趋势周期分解与随机冲击的持久效应》,《经济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③ 郭旭红:《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 GDP 中高速增长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④ 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http://data.worldbank.org.cn>。

值由高到低的排序,阿曼最高,高达 13.65%;博兹瓦纳次之,为 10.91%;再次是中国,为 9.87%。阿曼、博兹瓦纳都是小国,不具有可比性。从各国 GDP 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看,变异系数越大,GDP 增长速度的离差越大,波幅就越大;反之则相反。阿曼、博兹瓦纳 GDP 增长速度的变异系数在所比较的 11 个经济体中最大,分别为 1.47 和 0.56,而中国最小,为 0.28。通过国际比较显示,中国 GDP 增长速度呈现出显著的“高位—平缓型”特点:位势较高,波幅较小,稳定性较强。

表 1

二战后 11 个经济体 GDP 高速增长时期的增长速度

单位:%

年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韩国	泰国	马耳他	阿曼	印度尼西亚	博兹瓦纳	马来西亚	中国
1962	7.1	14.2	7.9								
1963	10.0	15.7	9.4	9.5							
1964	-3.7	8.6	12.2	7.6							
1965	7.6	14.5	11.1	5.2	7.9						
1966	10.9	1.8	8.9	12.7	11.1	10.8					
1967	12.3	1.6	10.7	6.1	8.6	6.9	66.2				
1968	13.6	3.4	9.2	11.7	8.1	10.1	81.9	12.0			
1969	13.7	11.3	9	14.1	6.6	6.4	25.7	7.5	15.1		
1970	13.8	9.2	11.4	8.3	11.4	12.6	13.9	8.2	17.1		
1971	12.1	7.3	12.9	8.2	4.9	2.5	0.9	7.0	25.8	5.8	
1972	13.5	10.6	13.3	4.5	4.3	5.8	9.8	7.9	26.4	9.4	
1973	11.1	12.3	12.8	12.0	10.2	4.1	-14.3	9.8	21.3	11.7	
1974	6.5	2.4	1.2	7.2	4.5	10.0	11.5	8.3	8.8	8.3	
1975	4.6	0.5	4.9	5.9	5.0	19.6	24.4	6.2	8.4	0.8	
1976	7.4	16.2	13.9	10.6	9.3	17.0	20.5	6.0	10.6	11.6	
1977	7.5	11.7	10.2	10.0	9.8	12.2	1.0	8.6	12.0	7.8	
1978	8.7	8.3	13.6	9.3	10.3	11.2	-3.7	9.2	14.3	6.7	
1979	9.4	11.6	8.2	6.8	5.4	10.5	4.3	7.1	12.1	9.3	7.6
1980	10.0	10.1	7.4	-1.5	5.2	7.0	6.0	8.7	12.0	7.4	7.8
1981	10.7	9.3	6.2	6.2	5.9	3.3	17.0	8.1	9.1	6.9	5.2
1982	7.2	2.9	3.5	7.3	5.4	2.3	11.6	1.1	12.2	5.9	9.1
1983	8.6	6.0	8.3	10.8	5.6	-0.6	16.7	8.4	13.1	6.3	10.9
1984	8.8	10.0	10.7	8.1	5.8	0.9	16.7	7.2	8.5	7.8	15.2
1985	-0.6	0.8	5	6.8	4.6	2.6	14.0	3.5	7.1	-1.1	13.5
1986	1.3	11.1	11.5	10.6	5.5	3.9	2.0	6.0	8.2	1.2	8.8
1987	10.8	13.4	12.7	11.1	9.5	4.1	-3.4	5.3	11.9	5.4	11.6
1988	11.1	8.5	8	10.6	13.3	8.4	6.0	6.4	19.4	9.9	11.3
1989	10.2		8.5	6.7	12.2	8.2	11.8	9.1	13.1	9.1	4.1
1990	10.1		5.7	9.2	11.2	6.3	-0.1	9.0	6.8	9.0	3.8
1991	6.5		7.6	9.4	8.6	6.3	6.1	8.9	7.5	9.5	9.2
1992	7.0		7.8	5.9	8.1	4.7	8.4	7.2	2.9	8.9	14.2
1993	11.5		6.9	6.1	8.3			7.3	1.9	9.9	14
1994	10.6		7.4	8.5	9.0			7.5	3.6	9.2	13.1
1995	7.3			9.2	9.2			8.4	7.0	9.8	10.9
1996	7.6			7.0				7.6	5.8	10.0	10
1997	8.5			4.7					8.0	7.3	9.3
1998				-6.9					0.7		7.8
1999				9.5					9.7		7.6
2000				8.5					8.3		8.4

续表 1

年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韩国	泰国	马耳他	阿曼	印度尼西亚	博兹瓦纳	马来西亚	中国
2001				4.0							8.3
2002				7.2							9.1
2003											10
2004											10.1
2005											11.3
2006											12.7
2007											14.2
2008											9.6
2009											9.2
2010											10.4
2011											9.3
2012											7.8
平均值	8.70	8.64	9.03	7.72	7.89	7.30	13.65	7.5	10.91	7.55	9.87
标准差	3.79	4.72	3.06	3.67	2.58	4.74	20.09	3.99	6.11	3.12	2.74
变异系数	0.44	0.55	0.34	0.48	0.33	0.65	1.47	0.53	0.56	0.41	0.28
持续年数	36	27	33	40	31	27	26	29	32	27	34

资料来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3; 中国台湾地区“经济计划和发展委员会”编印:《台湾统计资料手册 1997》。

(四) 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比较

经受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中国 GDP 增长率依然强势稳定。1996—2012 年的 17 年,中国 GDP 增长率相对比较平稳地保持在 9.7% 左右。泰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大,1998 年 GDP 增长速度骤降为 -10.5%,1999 年、2000 年稍有恢复,2001 年又降至 2.2%; 韩国经济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1998 年 GDP 增速猛降到 -6.9%; 1998 年,日本 GDP 增长速度降至 -1.8%,1999 年又下降至 -0.2%; 1991—2001 年是美国经济长达 10 年的扩张时期,之后 GDP 增长速度降低至 0.8%; 1998 年,俄罗斯 GDP 增长速度降至 -5.3%,2001—2012 年, GDP 增长速度在 5%—7% 之间。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 年美国、泰国、日本、俄罗斯都是负增长, GDP 增长率分别是 -2.0%、-2.3%、-5.5%、-7.8%, 韩国经济增长率迅速降为 0.32%, 印度和中国经济依然强劲稳定增长,但 2009—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为 9.2%, 高于印度 1.7 个百分点。^①

1978—2012 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经济发展奇迹;其持续时间和增速不仅明显高于 1953—1978 年 6.0% 的年均增速,而且超过了曾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和韩国。35 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汇率法)从 1978 年的 0.14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2 年的 8.23 万亿美元。2012 年,中国国民总收入(PPP 法)达到了 14.73 万亿美元;^② 同年,全球只有中国、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 10 万亿美元(PPP 法)。人均 GDP 以不变价计算由 1978 年的 190 美元升至 2012 年的 6 100 美元,提高了 31 倍。人均国民总收入在全球排名由 1978 年的 175 位上升至 2012 年的 112 位,^③ 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目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性、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资源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http://data.worldbank.org.cn>。余芳东撰写论文《对世界银行按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统计研究》2004 年第 5 期), 认为汇率转换的中国 GDP 数据由于汇率变化, 转换后的 GDP 仍包含着价格因素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实际经济规模; 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 GDP 数据, 由于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和计算方法的限制, 其结果明显高估中国实际经济增长; 李强撰写论文《用 GDP 评价新中国头 30 年建设成就的几个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指出用汇率法做 GDP 国际比较时, 应当同时提供购买力平价 GDP 作为参考指标。纵观 1978 年以来中国 GDP 实际增速, 虽然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有种种缺陷和不足, 仍能够总体上反映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创造的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

③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 2014》,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1 页。

环境恶化等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经济结构如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严重失衡已成为制约 GDP 高速发展的突出障碍。

三、新中国 GDP 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的原因

1978 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持续性和均衡性,与 1978 年以后的稳态经济增长相比,GDP 增速总是大起大落、大波大动。每一次经济衰退大多是由频繁的政治运动和激进改革造成的。1957 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1960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等严重摧残了中国经济,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造成了 1960—1962 年连续三年 GDP 负增长,经济严重衰退。1963—1965 年经济开始复苏,这三年 GDP 增长率反弹到 10.2%、18.3% 和 17.0%。但这一轮经济复苏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更大的、涉及面更广的政治运动开始了。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8 月中国经历了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搅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与规则,1967 年、1968 年和 1976 年 GDP 再次负增长(图 3)。^① 以上这些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另外,中国拒绝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与世界其他国家商品贸易,与世界繁荣的经济相对隔绝。1957—1978 年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资源配置依靠政府指令计划,排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造成整个经济波动幅度大,效率低下。

(一) GDP 高速增长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 GDP 高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主要因素有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全球化、传统人口红利、科技创新和固定资产投资。

1. 经济体制改革。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认为,制度对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条件下,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关,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② 1978 年以来,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开始向平稳型过渡。图 3 显示,每一次重大改革举措都没有再引起经济的大幅波动,从体制上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③ 改革红利释放与经济增长周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改革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1978 年,公有制经济占 GDP 比重达 99%,非公有制经济仅仅占 1%。2012 年非公有制经济对 GDP 增长和税收的贡献率分别超过 60% 和 5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高达 90%。^④ 个体、私营、外资经济逐步成为 GDP 增长、税收和就业增加的新动力。

1978—1991 年,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GDP 年均增速为 9.3%。1978 年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为释放人口红利和加快工业化进程创造了条件;1984 年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改革,尤其是商业流通体制改革,释放了被抑制的生产潜力,GDP 增速获得提高是很自然的。受到制度因素改变的影响,我国 GDP 增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⑤ 1984 年,中国 GDP 增长率高达 15.2%,达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峰。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繁荣走向过热,主要源于新旧经济体制存在摩擦。政府采取压缩财政支出和紧缩银根的“双紧”政策,国民经济经历了 1986—1987 年的“软着陆”、1988 年的价格闯关、1989—1991 年的治理整顿,1986—1991 年 GDP 年均增速下降至 8.1%。但是,这种曲折,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来说,只是前进中的问题、高速发展下的副作用。^⑥

① 黄志刚、刘霞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机制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5 页。

② 杨德才:《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6 页。

③ 武力:《中国发展道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92 页。

④ 王一鸣:《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3 页。

⑤ 刘洪、昌先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 GDP 数据准确性评估》,《统计研究》2011 年第 2 期。

⑥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第 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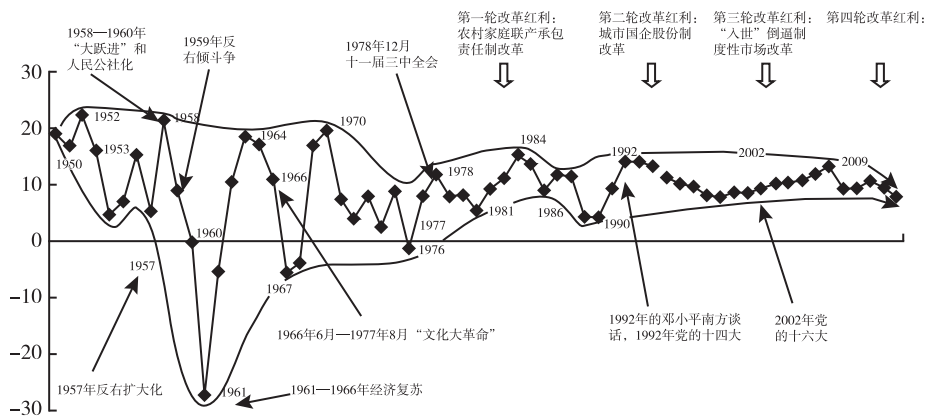


图3 1950—2012年中国GDP增长率和重要历史事件

资料来源:1950—195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1953—2008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第11页;2009—2012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说明: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上没有1950、1951、1952年GDP数据,用《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2页、第23页的国民收入代替,根据国民收入指数算出GDP增长率。

1992—2001年,我国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成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任务。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对外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开辟了空间;为扩大内需而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拉开了东部沿海地区先富后帮助内地发展的第二个大局的帷幕。这些举措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有力地支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①

加入WTO后,中国开始了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金融、商业、电信等服务业开放领域不断扩大,都给GDP高速增长带来较大的刺激,^②2002—2012年GDP增速高达10.3%。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改革,使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创新服务职能,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

2. 经济全球化。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2012年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资的国家。对外贸易成为中国GDP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④1979—2012年中国货物、服务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17.4%,远超过GDP年均9.9%的增速。一般情况下,出口增速超过GDP增速,出口对GDP的贡献上升,反之则下降。^⑤刘学武等学者用不同的计量分析方法,证实出口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⑥同时,中国具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优势和要素资源优势,吸引全球的直接投资者,外资

① 王一鸣:《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第18页。

②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第1022页。

③ 王劲松:《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跨国经济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与开放政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④ 刘树成:《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60年》,第51页。

⑤ 沈利生、吴振宇:《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⑥ 刘学武:《投资、消费、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1989—1999年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00年第9期;张明志、林娟、铁瑛:《出口专业化、出口多样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兼谈中国经济增长出口驱动力的转换》,《国家贸易问题》2013年第6期;丁正良、纪成君:《基于VAR模型的中国进口、出口、实际汇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12期;姚树洁、韦开蕾:《中国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互动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1期。

助推了中国 GDP 高速增长。^① 1979—2012 年,中国实际直接使用外资高达 1 万多亿美元,1984—2012 年,使用外资的年均增速为 22%,是同期 GDP 增速(10.2%)的 2 倍多(图 4)。外贸、外资迅速发展不仅是中国 GDP 高速增长的动力,而且对稳定全球经济、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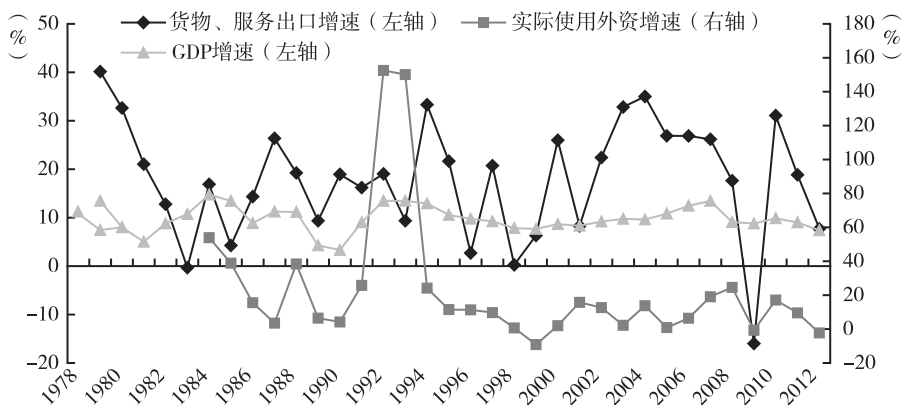


图 4 1979—2012 年中国货物、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外资增速和 GDP 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5》(电子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年版。

3. 传统人口红利。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承认,劳动力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条件。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成功地将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促进 GDP 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优势,将 GDP 送入高速增长的跑道,传统的人口红利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军。^② 根据国民经济总体增长趋势,将 30 多年人均 GDP 增长指数(1978 年 = 100)划分为三个时期(表 2):分别为 1979—1989 年、1990—2006 年、2007—2012 年,这三个时期人均 GDP 增速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 8.0、8.97、9.5;同期,人均 GDP 增速的标准差分别为 3.30、2.63、2.19,可以看出这三个时期的每一个后一时期的人均 GDP 增速都比前一时期高。这与 1990 年以后农业就业率下降一致:1979—1989 年、1990—2006 年、2007—2012 年,农业就业率下降幅度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 -0.9、-1.0、-1.5;同时这三个时期,农业就业率下降幅度的标准差分别为 0.98、0.97、0.30。农业就业率下降意味着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市,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市场机制下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劳动力流向城市地区和非农产业,促使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发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这表明劳动力城乡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与 GDP 高速增长之间具有深刻关联。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持续不断扩大,2009 年达到峰值 3.33:1 之后开始逐渐缩小,2011 年和 2012 年分别为 3.13:1 和 3.10:1。^③ 引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收敛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二,工业化加速推进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技术,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助推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④ 例如 2000—2012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 10.4%,其中工资性收入增长 18.6%,家庭经营收入增长 14.5%,尤其是 2005—2012 年,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 24.2%。^⑤ 这种变化趋势揭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报酬的差异是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动力源泉,而劳动力流动又促使劳动报酬差异收敛。可见,劳动力流动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并成为促进 GDP 高速增长的重要因

① 郭旭红、陈三攀:《经济开放度的再测算与中国经济增长》,《华东经济管理》2014 年第 11 期。

② 蔡昉:《未来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开拓》,《中国人口科学》2009 年第 1 期。

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3》(电子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肖卫:《中国劳动力城乡流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科学》2003 年第 1 期。

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13》(电子版)。

素。伍山林、姚志春等其他学者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劳动力流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①

表2 中国人均GDP增速、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变动速度的对比 单位:%

年份	人均GDP 增长速度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逐年变动速度	年份	人均GDP 增长速度	第一产业就业比重 逐年变动速度
1979	6.1	-0.7	1997	8.2	-0.6
1980	6.5	-1.1	1998	6.8	-0.1
1981	3.9	-0.6	1999	6.7	0.3
1982	7.5	0.0	2000	7.6	-0.1
1983	9.3	-1.0	2001	7.5	0.0
1984	13.7	-3.1	2002	8.4	0.0
1985	11.9	-1.6	2003	9.3	-0.9
1986	7.2	-1.5	2004	9.4	-2.2
1987	9.8	-0.9	2005	10.7	-2.1
1988	9.5	-0.7	2006	12.0	-2.2
1989	2.5	0.8	1990—2006 年均值	8.97	-1.0
1979—1989 年均值	8.0	-0.9	1990—2006 年标准差	2.63	0.97
1979—1989 年标准差	3.3	0.98	2007	13.6	-1.8
1990	2.3	0.0	2008	9.1	-1.2
1991	7.7	-0.4	2009	8.7	-1.5
1992	12.8	-1.2	2010	9.9	-1.4
1993	12.7	-2.1	2011	8.8	-1.9
1994	11.8	-2.1	2012	7.1	-1.2
1995	9.7	-2.1	2007—2012 年均值	9.5	-1.5
1996	8.9	-1.7	2007—2012 年标准差	2.19	0.3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电子版)。

4. 科技创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均物质资本的差异不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才是导致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② 图5显示,1992年以来,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2002年(23.7%)超过欧盟(19.1%),2003年(27.4%)超过日本(24.4%),2005年(30.8%)超过美国(29.9%),2005年后有小幅下降,但2012年达到26.2%,高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世界比重(16.9%)高于美国(16.8%)、欧盟(15.0%)、日本(8.0%)和俄罗斯(6.9%),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地。^③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中国经济和产业具备了创新优势。

表3表明,1998—2012年,分阶段科技进步对GDP高速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由1998—2003年的39.4%增加到2007—2012年的52.2%,相应地GDP年均增速由8.7%提高至9.3%,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竭动力。

① 伍山林:《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姚志春、尚海洋、毛必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真实贡献研究——基于机会成本视角下分析》,《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年第1期;齐明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4期;杜建军、汪伟、丁晓钦:《中国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与城市经济增长(1980—2011)》,《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G. Borjas,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2003, pp. 1335 - 1374.

② 王劲松:《开放条件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跨国经济增长差异、跨国技术扩散与开放政策研究》,第4—5页。

③ Tomas Meri, *China Passes the EU in High-tech Exports*, Luxembourg: 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 2009, p.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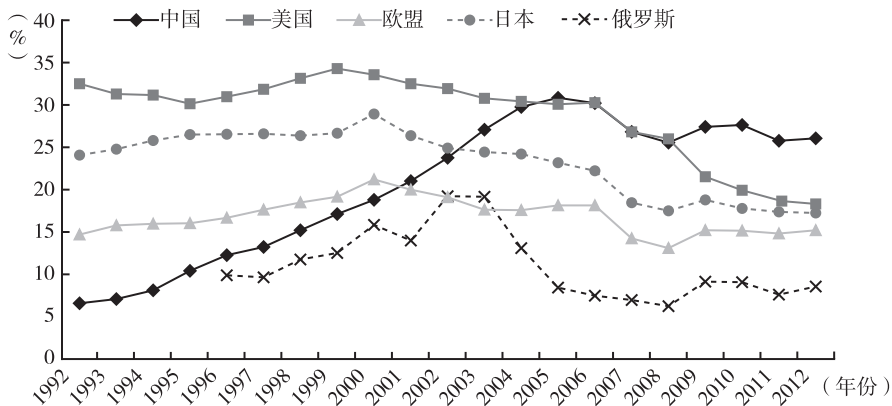


图 5 五大经济体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

表 3

1998—2012 年中国分阶段科技进步贡献率

单位: %

项目	1998— 2003	1999— 2004	2000— 2005	2001— 2006	2002— 2007	2003— 2008	2004— 2009	2005— 2010	2006— 2011	2007— 2012
科技进步贡献率	39.4	42.2	43.2	44.3	46.0	48.8	48.4	50.9	51.7	52.2
GDP 年均增速	8.7	9.2	9.6	10.0	10.4	10.8	10.6	10.3	11.1	9.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013》(电子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版。

5. 固定资产投资。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能够持续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从需求角度看,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的高投资。^① 固定资产投资有供给效应与需求效应,根据乘数原理,固定资产投资对宏观经济产生数倍于初始的投资增量效应,一方面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表现为供给效应;另一方面投资增量效应会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形成需求效应。无论是供给效应还是需求效应,均以多层次、多角度、多级别的螺旋形、波浪式的方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②

图 6 所示,1952 年以来,GDP 增速与投资率的波动状态高度一致,且投资率曲线高于 GDP 增速,说明高投资促进了高增长,但宏观经济绩效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前,投资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波动幅度偏大,整体 GDP 增长率并不快。1961—1963 年、1967—1969 年 GDP 增长率为负值,20 世纪 70 年代 GDP 增速明显下滑。投资增长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高达 30% 左右,宏观经济增长波动和 GDP 增长率显著改善。^③

从投资效率看,投资对中国 GDP 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减弱。以 1978—2012 年为例,GDP 增长对投资增长的弹性值变动趋势(图 7 纵轴的弹性值 = GDP 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表明,1991—1996 年数值小于 1,该值在 1997—2000 年出现过高值,从 2001 年后开始走低,大部分时间不超过 0.6。1993—2003 年是投资活跃、经济过热时期,投资增速快,但效果不好;1997—2000 年,中国经历了宏观紧缩和亚洲金融危机,投资大幅压缩、增速低,但这时期的投资效果相对不错;2003—2012 年,中国经历了高增长,但投资效果却越来越差,弹性值不断走低,并一度压制在 0.5 以下,这说明增速过猛。投资增速过快,是投资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图 7)。投资效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减弱,说明 GDP 高速增长的投资驱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二) GDP 中高速发展的动因

2013—2015 年,中国 GDP 由高速增长转入 7% 左右的中高速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当经济总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9 页。

② 黄志刚、刘霞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机制研究》,第 206 页。

③ 黄志刚、刘霞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机制研究》,第 27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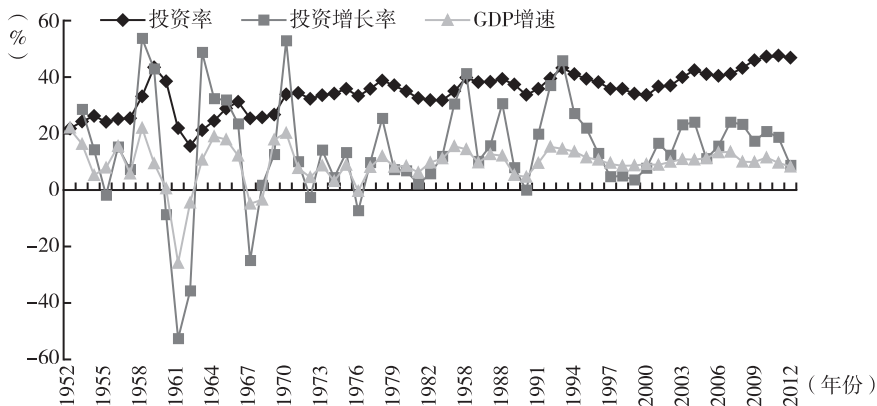


图6 1952—2012年投资率、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1978年之前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78年之后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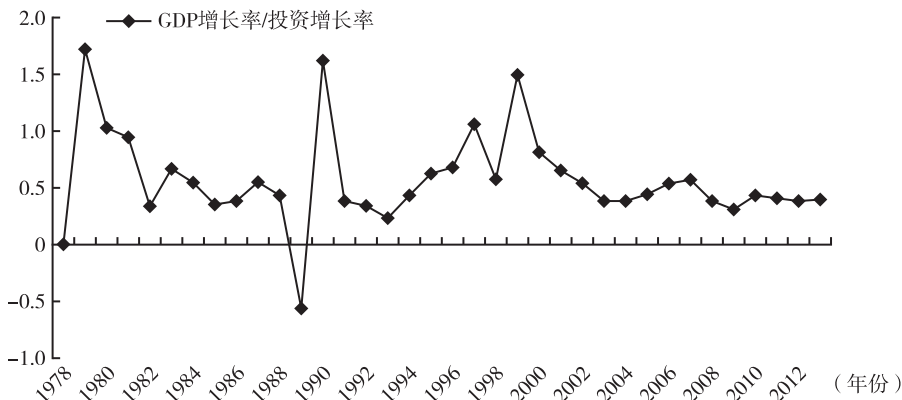


图7 1978—2012年中国GDP增长对投资增长的弹性值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

量达到一定规模后,GDP增速一般都会下降。从国内外环境条件来看,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至少有四大约束:一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越加严重,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全球经济脆弱复苏态势明显,经济下行压力增大。《2015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由3.3%降至3.1%,2016年将由3.8%降至3.6%。二是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刘易斯拐点”,截止到2014年,其累计减少近960万人。《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15》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全球比重为20.9%,印度为17.8%,相差3.1个百分点;2025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供给国;2030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占全球比重升至18.8%,中国则降至17.5%。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导致企业用工成本提高,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资的吸引力。与此相伴随的是,“未富先老”现象日趋严重。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5.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14岁人口占比为16.5%,^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老龄化总量大、速度快,人口结构面临最严峻的挑战。支撑GDP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步减弱并消失。三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支撑GDP高速增长的资源、要素、市场条件、社会环境均已显著变化,“稳增长”与“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提质增效是主要目标。四是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但人均GDP仅为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年版。

7954 美元,是日本和欧盟的 20%、全球平均水平的 70%,距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 5000 多美元。^① 保持 7% 左右的中高速发展,才能继续扩大经济总量,成为高收入国家。

四、新中国 GDP 增长速度发展演变的启示

对新中国 GDP 增长速度演变历程的系统考察并总结经验教训,将对新常态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历史的启示作用。

(一) 适度的 GDP 增速是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实践的探索

1949 年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形态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在中外经济史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 60 多年发生这样大的转变。1957 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前人未曾经历过的事业,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探索。1957—1966 年经济建设不仅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初步探索的十年。1967—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 GDP 增长速度停滞和混乱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1979—1991 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更重要的是揭开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模式的进程。这是因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从而能够承担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任务。1979—1991 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探索史上成绩辉煌的年代。1992—2012 年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在不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加速。^② 1953—2012 年中国 GDP(扣除价格因素)增长速度年均达 8.2%,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3%左右)的两倍多。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宏观经济格局深刻变化,GDP 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发展,这是遵循经济、社会、自然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

(二) 改革开放前、后 30 多年 GDP 增速是差异性与连续性的整体

改革开放前、后 30 多年,中国 GDP 增速既有差异性,也有连续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1950—1956 年,中国 GDP 高速增长,其中 1950—1952 年属于恢复性增长。此时期,我国经济效益较好,1956 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比 1952 年提高了 85.7%。1957—1978 年,由于片面追求 GDP 增速,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1978 年,全社会就业人员人均 GDP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0%。^③ 1978 年以后,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新阶段,实现了 30 多年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十三五”时期,GDP 增速换挡回落,由过去 10% 左右的高速迈入 7% 左右的中高速,经济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正进入新的阶段,新机制、新技术、新模式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形成。

新中国 67 年 GDP 增速的演变历程,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整体概括。在 1978 年之前的 30 年中,既有经验,主要是 1949—1956 年在多种经济成份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快速恢复与发展的经验;也有教训,主要是 1957—1978 年,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本停滞的教训。1979—2012 年 GDP 高速增长,2013 年以后中高速发展,是总结并吸取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得出,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② 此观点和材料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提供。

^③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91)》,第 402 页。

这些经验教训的产物。因为有前30年的经验教训与经济发展建立的物质基础,才会有后30多年的高速、中高速发展。如果将前30年弃之不提,单说后30多年,这后30多年的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之物。现阶段,GDP中高速发展,是对新中国GDP增长速度67年经验和教训的扬弃,是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客观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三) GDP高速增长、中高速发展的中国特色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前,已有不少经济体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以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为例,1956—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为9.2%;1963—1979年新加坡为9.3%;1966—1979年,韩国为9.1%。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一时期,有一些同为发展中国家,而且同是大国,诸如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同样进行经济改革,同样加入世贸组织,其目的都想利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为国际资本提供最好的再生产环境,谋求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它们获得了与中国相似的高速增长。但是,1978—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8%,超过1992—2012年印度经济快速增长时期GDP年均6.75%的增速、1948—1978年巴西经济高速增长时期7.2%的增速、1999—2012年俄罗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5.25%的增速。^①然而伴随GDP的高速增长,中国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资源环境红利减弱等问题凸显,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突出障碍。

目前,GDP中高速发展是中国新阶段新的发展形态,是世界追赶型工业化经济体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纵观世界经济史,追赶型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就会经历高速—中高速—低速的阶段转换。1956—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保持了18年9.2%的高速度,1973年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劳动力供给下降影响,GDP增速换挡回落,1973—1990年降为4.26%,速度下降一半多,1991—2012年骤降至0.86%,这两次GDP增长速度下降幅度都较大。1966—1996年韩国持续了31年GDP年均8.4%的高增长,^②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企业高负债率的影响,韩国GDP增速换挡回落,1997—2012年陡降至3.95%。1952—1994年中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速达8.62%,1995—2013年换挡回落至4.15%。上述经济体由于受到石油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GDP增速换挡回落,具有被动性、剧烈性特征,GDP增速几乎都是从高速直接切换至低速,幅度较大,对经济冲击力度大。中国GDP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是遵循世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并吸取上述经济体的经验教训,主动顺应经济发展客观趋势,主动抉择的结果。1978—2012年,中国GDP持续35年近两位数的增速,2013年、2014年、2015年GDP增速换挡回落,均在7.0%左右,降幅没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那么剧烈,具有主动性和平缓性特征。^③

(四) 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

以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结合世界主要大国工业化规律,系统总结历史经验,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GDP增速适度发展的标准是“四要四不要”:一是要能够带来“绿色”的发展,而不是带来生活环境污染的增长。二是要能带来“共享”的发展,而不要导致贫富分化甚至两极分化的增长。三是要带来“协调”的发展,而不要导致城乡对立的生长。四是要能够带来“持续”的发展,而不要一时的增长,要功在当代、惠及子孙,而不是功在一时、祸留后代的生长。按照上述要求,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内外环境条件,中国GDP增速应该以实践经验作为标准。1990年,赵德馨教授提出GDP年均增长速度6%—7%为适中的增速,经济总是波动中发展的。国民经济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得出, <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② 李铁:《韩国转型,为何能成功避免革命》,《领导文萃》2013年第11期。

③ 赵凌云、辜娜:《中国经济新常态与湖北发展新机遇》,《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若能以 GDP 年均增长率 6%—7% 的速度前进,^①可以保证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实现、产生巨大宏观经济效益,有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九五”计划提出 GDP 年均增长率是 6%—7%。^②“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中共中央提出 GDP 增速的目标是 7%。刘世锦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 GDP 增速将由 10% 左右的高速,回落到 7% 左右的中速发展。^③2015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三五”时期中国 GDP 保持 6.5% 以上的中高速增长,^④就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于以上分析,在遵循“四要四不要”的前提下,以 7% 左右的 GDP 增速为比较适中的速度,就能够以质量效益为前提,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符合中国现实国情。7% 左右的 GDP 增速是一个动态概念,意味着经济增长要从实际出发,能快则快,也是一个全面、协调、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

The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Growth Speed of GDP

Guo Xuhong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overall growth speed of GDP is fas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is present as “high speed, low speed, high speed and mid-high speed”. Compared with China's macro economy and all regions micro economy in those 30 year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se two aspects of economy both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after that policy, which realized the macro situation of “fast development, low inflation”. While making a comparison of rapid growth economy entity after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countries shocked by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China has broken the record of GDP growth in world economic history from 1978 to 2012. The main motivation of high speed development of GDP is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At present, restricted by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China's GDP has transformed from high speed development into mid-high speed. To review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China's GDP systematically, and to study the fluctuations causes In-depth,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standard for moderat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DP growth, is making an enlightening role of mid-high development in New Economic Normality historically.

Key Words: New China; Growth Speed of GDP;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责任编辑:黄英伟)

① 赵德馨:《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增长速度》,《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

③ 刘世锦:《增长速度下台阶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 5 期。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 70 页。